

历史学家如何经世致用

——郑天挺的经验与意义*

胡 伟 赵兴胜

【提要】 发扬中国史学特别是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既要重视一般理论的探讨,更要重视史学家个体经验的发掘整理,以资示范与引导。郑天挺的经验就是很好的案例。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实践具有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等特点:他“观世”以国计与民生为重,“顺世”以历史大势为依归,“入世”以善作致用之学、善用忠恕之道、善谋民生之需、善于学以致用为特点。郑天挺的经验说明,学术成果需要走出书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个人学术成就固然重要,经世致用追求下的公共贡献同样不可或缺。

【关键词】 郑天挺 经世致用 历史学家 学术传统 当代中国史学

经世致用不仅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品格”。^①围绕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学界有诸多讨论和极具启发性的意见建议。笔者以为,将这些意见贯彻到具体实践中,还需要辅之以大量的史学家个体经验的梳理与总结,以资示范与引导。史学大家郑天挺的相关思想与实践就是极好的案例。以“求用”思想为指导,他跨越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时代,历经巨变而与时俱进,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成了一些旧史学者转变为新史学者的光辉榜样”。^②同时,他还长期担负大学行政管理工作,深受上级赏识与师生拥戴。^③但整体上看,既往有关郑天挺的研究,大多以其学术活动为主题,特别是在隋唐史、明清史等领域的贡献及其经世致用思想渊源的研究;^④至于后世学者如何借鉴其“求用”技巧,则缺乏系统性梳理分析。同时,人们很少思考、发掘两者间的相辅相成关系。窃以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很难理解他作为旧学出身的史学家,何以能执当代中国史学之牛耳,^⑤也不利于学界同仁继承发扬其经验与智慧。鉴于此,笔者拟以新近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编号:16KZD021)的阶段性成果。

① 左玉河《求真与致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双重品格》,《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

② 任继愈《回忆郑毅生先生几件事》,《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③ 谢国桢《悼念郑天挺先生》,《中国史论丛》1982年第2辑。

④ 关于郑天挺在隋唐史、明清史等领域的贡献,参见孙卫国《郑天挺先生与二十世纪的明史研究》,《中国文化》2012年第1期;段晓亮《郑天挺隋唐史研究的成就与特色》,《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常建华《郑天挺先生与20世纪的清史研究》,《安徽史学》2019年第4期。关于郑天挺的经世致用思想渊源的研究,参见南炳文《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三十年——郑天挺教授在南开大学》,《南开学报》1999年第5期;段晓亮《郑天挺史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4年,第241—244页;周文玖《郑天挺与中国现代史学》,《南开学报》2020年第5期。

⑤ 郑天挺1956年被评为新中国首批一级教授,1981年出任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历史组组长(与夏鼐同任组长)。参见孙卫国《郑天挺先生学术年谱》,孙卫国编《郑天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88、591页。

出版的、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为基础,沿着“观世”“顺世”“入世”三个递进的逻辑层面,进一步梳理、分析其“求用”思想及实践。

一、观世:以国计与民生为重

“观世”亦即“洞察时势”。古人推崇“高明远识,洞鉴古今”,^①经世致用的前提条件在于正确地洞察时事。早在青少年时代,郑天挺就“喜欢谈论时事”,与同窗好友见面,也常常是纵论国内外大事,“有时直至夜深”。^②成年后,他阅历日深,对时事的关注更广更深,对洞察时事的意义及方法也有独到的见解和卓有成效的实践。

(一) 郑天挺认为洞察时事、把握现实需求是做有用之学的前提。他很早即强调,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只有“认识了现在,才能自觉地积极地建设未来”,^③历史研究“要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④直至去世前,他还不断撰文重申“求用”问题,强调“研究历史要有用”,要找出规律性,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⑤同时,他还认为,紧盯现实是实现学术创新的前提。他提倡多读书,但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地、实事求是地读好书”;^⑥他强调只有洞悉社会发展的最新趋势,才能捕捉到新的研究课题,才“能够有所创新”;^⑦他特别强调青年人“要知道时代潮流,要跟上时代”。^⑧此外,他也把开展社会调查视为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许多旧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造运动的不理解、甚至消极抵触不同,郑天挺视之为“学习近代史的好课堂”,^⑨除了自己先后两次赴湖南长沙、江西泰和等地参加土改运动,^⑩他还鼓励其他师生积极参与。可以说,虽然身为历史学家,但郑天挺对现实的关照始终如一。

(二) 郑天挺的观察重点在国计与民生。这在郑天挺日记中有比较突出的反映。他的思考和记录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令人印象最为深刻者有三。一是高度关注抗战局势。据粗略统计,其中相关记录不少于50次。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他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充满了忧虑。例如,他在1938年6月13日写道“战事大坏,物价蜚腾”;^⑪1939年9月17日写道“日本与苏俄又有协定,如是吾将何堪?”^⑫二是高度关注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走向,对其政风表现出强烈不满。针对其办事效率低下,他曾批评道“一日间往邮局两次,每次探寻六七处,始得东西支吾,人言言殊而佯若不闻,说而不详之态度,尤为可恶。呜呼!我国之公务员!”^⑬针对其官僚生活奢侈之风,他曾批评道“默计今日

① 钱世昭《钱氏私志》,金沛霖主编《四库全书子部精要》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年版,第686页。

②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73页。

③ 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08页。

④ 白新良等《回忆我们的老师郑天挺先生》,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272页。

⑤ 郑天挺《漫谈治史》,《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

⑥ 郑天挺《历史科学是从争鸣发展起来的》,《光明日报》1961年4月4日。

⑦ 汪茂和《郑天挺治学思想与治学作风》,《南开教育论丛》1986年第4期。

⑧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155页。

⑨ 钟文典《回忆郑天挺老师》,《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⑩ 杨翼骧《怀念郑天挺师》,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899—199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页。

⑪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69页。

⑫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188页。

⑬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96页。

宴客于此者达二十四桌,是一夜一地之费逾万元矣”,“推此计之,昆明一日酒食征逐之费在数十万以上。此岂战时景象耶?”^①针对国民党军军纪败坏与战斗力低下,他批评道“此次河南之败,在统帅蒋鼎文之怯懦,既不在黄河以北设防,而本人又先为撤退。敌人方至虎牢关,而蒋已退洛宁,既而又退西安,以至士卒动摇。且既败之后,又不使洛阳部队撤退,以至无谓牺牲者有二师之多。”^②三是高度关注和同情底层民众。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统区经济危机不断加剧,民众生活日趋艰难。虽然身为西南联大教授,但郑天挺自己也常常为生计所困,^③却依然对底层民众的疾苦给予特别关注。例如,1939年8月29日,他在考察昆明郊区龙泉镇后写道“归途四望,碧茵万顷,全属稻田,此间可称天府,而人民衣腹不完,何哉?”^④1942年5月15日,他在街头看到逃难回国的华侨靠典卖“旧衣日用”以维持生活后写道“想见其远道流离,去衣就食之苦,衷心伤之”,而“此间黠者,更欲于此哀黎求非分之利,可恶之至!”^⑤笔者认为,他的上述观察、思考对其1949年的政治选择,具有直接而关键的影响。

(三) 郑天挺观世的路径与方法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特点。概而言之有三。其一,持续开展学术研究。作为历史学家,学术研究无疑是他洞察时事的主要手段。^⑥正是此类研究,^⑦使他累积了洞察时事、处理时务的知识、素养与能力,特别是对民族文化和国家未来的坚定自信。1941年1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见熙熙攘攘,交易不殊平时,若不知轰炸之可畏者。中华民族诚伟大哉!”^⑧1945年5月21日,他给进修班学生讲演文化问题时又进一步强调“离开民族性不会有自己的文化”。^⑨

其二,深入社会生活。一方面,他作为北京大学(1933—1950年担任秘书长)、西南联大(1940—1946年担任总务长)的主要行政负责人之一,为学校之存亡兴续,师生之衣食住行,常常周旋在各界之间。例如,1940年5月25日,他在日记中记道“八时起。九时诣勉仲,商学校购办公米事。”^⑩1942年1月10日,他记道“八时起。九时入校治事。学生条告未撕,命工友洗去之,已净。”^⑪1944年9月11日,他在日记中说“十时至西仓坡招待银行界,为建筑校舍事也。菜冷而劣。席散,始知月涵先生忘未招呼,临时于街头求之也。其价亦达四千馀元,可畏哉!”^⑫另一方面,基于隋唐史、云南地方史学术研究等方面的需要,他也常常实地勘察历史地理、社情民俗。如,1941年5月16日至8月26日,他与梅贻琦等人对四川乐山、峨眉、成都等地进行考察;^⑬1944年7月20日至8月23日,

①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512页。

②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第841页。

③ 冯尔康《西南联大教授的日常生活——以郑天挺教授为例并以他的〈西南联大日记〉为资料》,《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④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183页。

⑤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555页。

⑥ 参见陈生玺《史学大师郑天挺先生的宏文卓识——纪念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899—1999)》,第33—48页。

⑦ 例如,他对西南边疆历史地理问题的系列研究,参见郑天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卷第1期,1939年3月;郑天挺《〈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国学季刊》第6卷第4期,1946年;郑天挺《〈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国学季刊》第6卷第4期,1946年。

⑧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369页。

⑨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第1039页。

⑩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274页。

⑪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504页。

⑫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第927页。

⑬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417—500页。

他与罗常培等人对大理等地进行实地调查。^①以上活动都使其获得了无数观察学术与政治、精英与大众、官方与民间等社会复杂面相的机会,因此产生诸多感慨。例如,1944年7月2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一时四十分抵安宁,去昆明三十二公里。饭于昆安饭店,店极小而价昂,竟高出昆明。饭后参观滇西企业局,仅煮盐场在此,极简单,无可观。盐卤用钢管自二十一公里外之盐涌井引来,在此煮晾,每日出品二三万斤,有工人二百人。盐涌井有工人六十人,规模之小,殊出意外。”^②这种体验远非普通学者或行政人员所可获得。

其三,关注媒体及舆论。以近代工业为基础的报刊、广播等新媒体具有传播快、传播广、内容新等特点,日益成为知识分子追踪国内外大事、了解市井百态的重要渠道。从其西南联大日记所见,郑天挺主要阅读《朝报》《益世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纸,以及《治史杂志》《史学杂志》《西北论衡》《国学季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宇宙风》《真理杂志》等杂志。郑天挺也特别注意从报刊中收集这方面信息。如,1939年1月2日的日记写道“报载汪兆铭违反纪律,危害党国,永远开除党籍。”^③1940年9月28日的日记写道“今日报载昨日德、意、日三国同盟签字,又美国贷我美金二千五百万元,国际局面显成两大壁垒,不知苏联将孰从也。”^④

与许多亡国论者不同,郑天挺对中国抗战充满了必胜信心“与介泉谈家常及时事,语及时事,余谓明年夏,同盟军必胜,中国必胜。”^⑤特别是对取得抗战胜利的时间节点他也有令人惊奇的预判。他在1944年9月3日曾预测“本年欧战必可结束,明年今日江南必无敌踪,而我辈可稍移动矣。”^⑥数月之后,日军战败投降,中国赢得了抗战的最终胜利。日本战败投降后,曾有天皇剖腹自杀的传言。听到这一消息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就余之纯粹东方看法,以推测其可能结果:一、军阀必有继死者;二、在外军人可能有疯狂式之焚杀;三、皇位或能保全;四、日本人仇盟国心理永不能灭。姑书之此,以规将来。”^⑦证之历史,天皇自杀之说虽是假的,但“皇位或能保全”的推测完全正确。这或与其作为历史学家对整个东方文明的深刻了解有着直接关系。

二、顺世:以历史大势为依归

“顺世”就是与时俱进,是基于历史洞察判断的选择和坚守,也是实现“经世致用”理想的政治与社会基础。郑天挺之所以能历经巨变而始终屹立潮头,核心在于能够“顺世”。既往研究侧重对其选择结果的记录,对其选择的背景、过程反而重视不够,这也使得其内在思想体系与外在的方法论意义,不能得到充分彰显,因此,还须从思想特质入手,深入分析他的“顺世”智慧。

(一) 顺应时代思潮。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自由、民主、科学是进步知识分子追求和实践的目标,郑天挺亦不例外。例如,五四前后他阅读不少进步书籍,在北大求学时阅读《新潮》

①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第861—919页。

②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第862页。

③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122页。

④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317页。

⑤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542页。

⑥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第923页。

⑦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第1082页。

《国民》等刊物。^①在北京大学担任秘书长时,他忠实地执行了自蔡元培以来的“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方针,强调学术、教学要和政治分离,政治不能干预学校;^②对参与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步学生,他竭力保护。^③

就目前资料所见,1949年前,郑天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接触不多,更谈不上积极主动地研读、传播,这或许与其作为一个旧派学者直接相关。但是,从其自传、日记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没有任何批评,相反,还有某种程度的同情、赞赏。例如,他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在1933年完成了中共创始人李大钊遗体的安葬。据他回忆:“参加了1933年春天北平市各界市民为李大钊同志的安葬仪式。李大钊同志也是我在北大的老师,蒋梦麟等人也都和他同事。送殡的那天,一齐去了不少人。我们都看到了地下党以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名义送给李大钊同志的那块碑,碑的正上方还刻有斧头镰刀。当时大家感到,如果不把这块碑妥善处理,必然会遭受国民党当局的干预,反而会给安葬仪式造成麻烦,于是决定把这块碑埋在地下了。”^④在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和“围剿”中国共产党的形势下,他的这一行为是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

1949年后,他在北平亲眼目睹了“进城的解放军和干部公而忘私、纪律严明的好作风”后,亦盛赞中共有“这样好的干部、这样好的军队”。^⑤因此,对于新的科学理论的学习与运用,他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热情。魏宏运曾回忆,1953年,他和郑天挺“每周去马列主义夜校听课一次,地址在天津大学礼堂”,^⑥郑天挺从未旷课,他们还曾一同去北京向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列主义史学家“请教讨论”。^⑦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郑天挺阅读学习的马列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三大类六十余种。^⑧他对毛泽东思想亦深入钻研,对于毛泽东的许多名言,如“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⑨曾在诸多场合直接或间接引用。^⑩这些学习也使其学术研究的层次与视野显著提升。他的学生南炳文曾说,南开时代的郑天挺,论文视野比解放前大为开阔;^⑪任继愈也谈到,郑天挺运用马列主义做出了优异成绩;^⑫他本人也曾深有感悟地说,若不是解放以后“接触了马列主义”,就无法整理与利用过去的东西。^⑬

(二) 顺应政治革新。在关键历史节点的选择上,郑天挺总是站在顺应政治革新的一方。诞生于清末、成长于民初的郑天挺,青少年时期即紧跟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参加旅京

①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374页。

② 封越健《“郑天挺教授诞辰百年纪念会”暨雕像落成仪式纪要》,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899—1999)》,第392页。

③ 吴相湘《郑天挺师百年诞辰纪念——解答六十年一疑团》,《传记文学》第75卷第2期,1998年8月。

④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385页。

⑤ 戴逸《我所了解的郑天挺教授》,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363页。

⑥ 魏宏运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魏宏运文集 魏宏运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页。

⑦ 魏宏运《毕生心血献史学——忆郑天挺教授》,《天津日报》1982年2月5日。

⑧ 段晓亮《郑天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⑨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815页。

⑩ 郑天挺《漫谈治史》,《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

⑪ 南炳文《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三十年——郑天挺教授在南开大学》,《南开学报》1999年第5期。

⑫ 任继愈《回忆郑毅生先生几件事》,《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⑬ 鲁诤《与郑天挺教授谈明清史的研究与教学》,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0页。

福建学生组织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①参加刘和珍等进步学生组织的反对段祺瑞政府反动统治抗议活动。^②他的首份工作是担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的法权讨论委员会秘书,期间编撰了其平生第一部学术著作《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③全面论证并强调“领事裁判权已无须与存在之必要章章明矣”。^④

随着日本全面侵华及北平的沦陷,南京国民政府做出了北大、清华等高校南迁继续办学的决定,许多学校师生随之响应南下。时任北大秘书长、中文系教授的郑天挺则在南下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一方面,他的一些师长故旧希望他留下来,胡适就曾劝其留下搞研究,“能忍痛维持松公府内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⑤更有甚者,劝其委身日伪殖民者。例如,1937年11月17日,他的北大同事钱稻荪专门追到天津,劝阻已经启程南下的郑天挺,劝郑天挺不要走,说他一走北大就要垮,要为北大着想。^⑥另一方面,个人家庭生活极其困难。当时他的夫人去世不足一年,五个孩子最大者13岁,最小者只有三岁,无人照料。^⑦尽管如此,他还是顶着巨大压力,安顿好子女,决然南下,以学者、教师的身份参与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军事上的溃败,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筹谋将北大、清华等学校南迁。对此,郑天挺坚决表示反对。^⑧在上述谋划失败后,南京国民政府又做出了“抢运”知名学者南下的计划,拟定了包含理、工、医、文等学科三十多人的抢运名单,^⑨多次派出专机赴北平迎接,多渠道进行劝说动员,^⑩其中也包括郑天挺,但他都断然拒绝,^⑪最终留了下来,保护师生校产,并完整移交人民政府。

尽管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受到一定冲击,但整体上看,郑天挺在新中国时期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他的学术研究层次大大提升,^⑫在学界和社会的地位也空前提高。1981年,他当选为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同年应邀出任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届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历史组组长(与夏鼐同任组长)。他先后两次出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3—1966年、1979—1981年),还担任了天津市政协副主席(1980—1981年)等重要职务。^⑬这也意味着他对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与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等人相比,他也幸运得多。有关这一点,郑天挺自己就曾不无遗憾地指出,他们如果留在大陆,是可以作出更大学术成就的。^⑭

①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375页。

②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381页。

③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379页。

④ 法权讨论委员会编《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京华印书局1923年版,第61页。

⑤ 胡适《致郑天挺(节录)》(1937年9月9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34页。

⑥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387—388页。

⑦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386页。

⑧ 郑嗣仁《郑天挺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899—1999)》,第76页。

⑨ 段晓亮《郑天挺史学研究》,第51页。

⑩ 郑晏等《三十年风风雨雨——郑天挺与北京大学》,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第194页。

⑪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398页;任继愈《回忆郑毅生先生几件事》,《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⑫ 他更加重视研究现实问题,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使研究更有深度与广度,并取得丰硕成果。参见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续探》,《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郑天挺《清代的幕府》,《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⑬ 郑嗣仁《郑天挺教授大事记》,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第540—543页。

⑭ 鲁诤《与郑天挺教授谈明清史的研究与教学》,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第382页。

(三) 顺应民意。郑天挺思想有鲜明的“民本”特色,这典型地体现于以下事例中。

其一 顺应同事推举,参与大学行政管理工作。1933年暑假,北大秘书长王烈辞职后,时任校长蒋梦麟提议郑天挺继任,但郑氏考虑到自己的职业兴趣,不愿就任。^①后在胡适、刘半农等师长和同事的反复敦劝和鼓励下,他才同意接任。^②1940年1月,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辞职,联大常委会决定聘请郑天挺继任,并很快发出聘书,^③但郑氏明确拒绝。后在蒋梦麟、傅斯年等人近两周时间的劝说下,并考虑到避免“引起校际间之摩擦,影响合作局面”,^④他才正式同意接任。他在北大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等岗位上工作近十八年之久,还在同事公推下于1939年5月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

其二 接受学生诉求,改革宿舍分配制度。在郑天挺接任北大秘书长前,北大的学生宿舍管理制度备受诟病,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建立起严格统一的分配制度,“一般多由老学生移让给相识的新学生”,新入校学生虽可以提出宿舍申请,但是真正申请成功则遥遥无期。1934年,郑氏在接到学生的改革请愿后,即拓展资源、完善制度,并公开承诺:全体一年级新生有愿住校者,一律配给宿舍。此举深受学生欢迎。^⑤

其三 顺应学生民意,支持进步学生从事社团活动。多元而丰富的社团活动是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的重要办学特色,这与校方在资金、场地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有着直接关系。许多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乃至革命者,都是从这些社团中走出来的。但抗战胜利后,在国民政府操作下,北大校方企图通过收回社团活动场所等方式压制进步青年,打击进步力量。郑天挺虽为校方负责人之一,但在接到学生求助后,仍坚持过往政策,明确对学生表示“社团所用房间可以继续使用,不必收回”,^⑥这也使得学生社团活动得以继续开展。

简言之,郑天挺的大学管理理念及实践经验就是强调以师生为本,处理校务作风要民主。^⑦这同样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经世致用经验。

三、入世:学以致用

“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是儒家思想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曾国藩曾言“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⑧因此,学以致用也就成为知识分子实践其积极入世理想的基本路径,郑天挺亦不例外。

(一) 善作致用之学。一方面是积极践行“学术救国”的精神。在“求用”思想指导下,郑天挺的学术研究总是着眼现实,努力践行“学术救国”的理念,包括1952年他调任南开大学后,推动南开明

①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383—384页。

② 杨志玖《重温郑师的治学轨迹》,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899—1999)》,第13页。

③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2 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④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237页。

⑤ 王德昭《铿然舍瑟春风里——述往事忆郑天挺毅生师》,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56页。

⑥ 戴逸《我所了解的郑天挺教授》,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360页。

⑦ 蒲郁明《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21年,第31页。

⑧ 曾国藩著、潘爱平评注《挺经》,吉林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清史研究,“培养出有自家面貌的南开史学风范和传统”。^①有关这一点,学界已有讨论。^②但他在1947年发表的《琉球应归中国》一文,却很少被关注。该文强调,无论从感情、历史还是法律层面,琉球均理应归属中国。^③21世纪以来,张海鹏连续撰文,强调依照国际法及日本战败后的承诺,不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湾等岛屿要回归中国,“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并深入分析了“琉球地位四大悬案必须再议”的理由。^④张文一出,震动日本朝野,一时间成为国际外交界、国内外舆论界的热门话题。^⑤通过张文的发表及其反响这一事例,再回望七十多年前的郑文,才能发现后者独特的战略意义。

另一方面,郑天挺强调学术研究要服务于人才培养。他认为,“搞科研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教师来说,研究一定要为教学服务,我不赞成不愿教书光想搞研究的做法。”^⑥基于这种认识,他本人虽长期担任行政工作且事务繁杂,但从未放弃教学研究。与此同时,他也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教学用书的编撰工作中。1961年,教育部组织编选文科教材,郑天挺任历史组副组长,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合编)及《史学名著选读》。^⑦1979年冬,郑天挺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⑧从后世学者的许多回忆来看,郑天挺之所以被称之为“宗师”,^⑨显然与其在史学人才培养领域的贡献有着直接关系,特别是经其调教,^⑩一大批青年人成长为史学大家。^⑪

此外,郑天挺还身体力行开展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以学术成果教育社会大众、引导社会舆论。例如,面向社会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讲演。据统计,仅1939年7月至1946年5月,他就应党政机关、文化教育、工厂企业等诸多单位邀请举办各类学术讲演27场,内容涉及制度、文化、地理、民族、科学等领域。^⑫再如,他在报刊上发表了許多知识普及类文章,内容涉及禁烟问题、国都搬迁问题、使馆界问题、学习历史问题、治史问题等。^⑬

(二)善用忠恕之道。对于郑天挺的行政才能,吴有训曾赞誉道:“现在内地各大学无不痛骂总务负责人,只有西南联大例外。”^⑭何炳棣回忆,1939年秋到昆明以后与清华办事处的几位“故人”偶

① 参见王德昭《铿然舍瑟春风里——述往事忆郑天挺毅生师》,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55页;冯尔康《探微治史 泽被学林——郑天挺先生办学、治学精神常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页。

② 白寿彝《爱国·进步·谨严·笃实——悼念郑天挺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2月19日。

③ 郑天挺《琉球应归中国》,《益世报》1947年11月21日。

④ 张海鹏《张海鹏论近代中国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564—569、570—573页。

⑤ 赵兴胜《探究历史 着眼现实——读〈张海鹏论近代中国历史〉的几点体会》,《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⑥ 刘泽华《教诲谆谆多启迪》,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160页。

⑦ 缪钺《怀念郑天挺先生》,《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⑧ 郑嗣仁《郑天挺教授大事记》,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第542页。

⑨ 周文玖《郑天挺与中国现代史学》,《南开学报》2020年第5期。

⑩ 钟文典《回忆郑天挺老师》,《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⑪ 曾受教于郑天挺,后在史学等领域取得成就者有:先秦史专家王玉哲,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何兹全,元史专家杨志玖,明清史专家商鸿逵、南炳文、何炳棣、戴逸、冯尔康,近代史专家吴相湘、钟文典、魏宏运,中西交通史专家王德昭,方志专家傅振伦,古文献学专家张政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专家刘泽华以及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等等。由于人数较多,受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参见《郑天挺学记》《郑天挺先生学行录》等。

⑫ 雷冠星《郑天挺西南联大时期的史学实践(1938—1946)》,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20年,第61—62页。

⑬ 郑天挺《中国近百年来之禁烟历程》,《中央日报》(昆明版)1945年6月3日;郑天挺《宪法中的国都问题》,《益世报》1946年12月18日;郑天挺《〈辛丑条约〉与所谓使馆界》,《进步日报》1951年9月7日;郑天挺《怎样学习历史》,《历史教学》1981年第2期;郑天挺《漫谈治史》,《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

⑭ 郑嗣仁《郑天挺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尔谈及联大人事时,发现“清华的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教务长樊际昌皆不无微词,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的学问、做人、办事才干和负责精神都很倾服”。^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他的行政能力的思想来源是什么,人们却谈得不多。事实上,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其经世致用的思想与经验。笔者认为,他的成功主要在于能够较好地汲取与运用研究中所获得的经验与智慧。比如,他倡导和实践的“以小见大”研究模式,^②以及由此而养成的知微见著的洞察能力。^③其中,最关键的是对传统文化“忠恕”精神的发扬和实践。

郑天挺对“忠”的实践,一是对国家之忠,抗战初期他的“决然南下”、解放战争后期的“拒绝南下”及“学术救国”,即是生动体现。二是对职责之忠,他做事有担当,工作严谨细致。在担任北大秘书长后,他主持并亲自监督各类建筑施工。^④抗战初期以及解放战争后期,他一人独撑危局,被誉为“北大舵手”。据张守常回忆,1948年12月北大50周年校庆之际,“记得当时北大学生自治会送给他一面大红绸子作的旗子,大书‘北大舵手’,上款写‘郑秘书长’,是对郑先生为北大全校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⑤三是对师长之忠。他和著名清史学家孟森的关系,真正体现了“事师之犹事父”的精神。^⑥四是对朋友、家庭、爱情之忠,也异乎常人。^⑦

郑天挺的“恕己”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注重自省、自律,为人谦虚。例如,1940年12月13日,其日记谈道“六时归。晚饭后入校,以校中同人遇事推诿,不觉盛怒,厉色严斥之,此为平生所未有也。事后深悔之。”^⑧1941年2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颇易发怒,下午在校为体育组房屋又盛怒,惟随即猛省,强自遏制。身体不舒欤?心境不泰欤?睡眠不足欤?必有一于此也,戒之慎之。”^⑨二是利益面前先人后己。例如,西南联大时期,有昆明富商看到联大教授生活艰苦,打算资助若干人以生活补贴,梅贻琦等人推荐了郑天挺,但他却以“无功受?甚不安,且校中更有穷过我者,谢之”。^⑩三是富有同情心。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对昆明进行无差别空袭轰炸,给当地民众造成巨大伤亡。每遇空袭,郑氏即与师生同进退,且常常以“否则何以对诸生哉”相自律、自省。^⑪资料还记载,其时北大文科研究所所在的昆明龙头村,距城数十里,但郑天挺常常步行去看望学生,并努力设法改善学生生活,有时甚至自掏腰包。^⑫

(三)善谋民生之需。经世致用的关键在于解决问题。郑天挺不但学术上倡导“求用”,关注天下之民生,而且努力解决了身边很多民生问题。举其要者如下。

一是积极筹集学校发展经费。这在其日记中有很多记录,如1940年5月23日记“九时入校,大体决定全年经费二百七万元”,“增百分之五十”;^⑬1941年4月23日记“至西仓坡开常务委员会,

①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② 蔡尚思《郑天挺同志治学与做人的特色》,《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③ 孙卫国《治学致精微 微处见大义——谈郑天挺先生的治学方法》,《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3期。

④ 郑嗣仁《郑天挺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899—1999)》,第71页。

⑤ 张守常《怀念郑天挺先生》,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899—1999)》,第21页。

⑥ 段晓亮《郑天挺和孟森的学术交往与明清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1期。

⑦ 田正平《忠厚诚笃 家国情怀——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札记》,《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⑧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351页。

⑨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378页。

⑩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第957—958页。

⑪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222页。

⑫ 程溯洛《怀念郑毅生老师》,《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⑬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273页。

讨论今年预算分配”；^①1943年5月25日记“至才盛巷，六时假其地宴中央银行主事人，为校中经费借款事。”^②这些工作与努力确保了学校的正常运转。他还特别重视教职员工薪资的正常发放，如1943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余任总务长，必于月底发薪，未尝稍迟。”^③

二是积极稳妥地解决师生们的吃饭住宿问题。抗战期间，针对物价飞涨、西南联大师生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他倡导大家组织消费合作社，开展供求调查，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商洽，^④“设法代学生及教职员购办食米”。^⑤抗战胜利后，他代表北大接管整理伪北大，适应师生复校需求，多方筹措房源，比较好地解决了师生尤其是教授们的住房问题。^⑥

三是积极协助学生就业。尽管民国时期大学生较少，但是依然存在“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对此，郑天挺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公开撰文呼吁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提出“发动学生去做各种社会服务工作”等解决就业问题的意见建议。^⑦此外，他还向相关部门或单位推荐毕业生。据何兹全回忆，抗战初期，他在重庆处于半失业状态，生活“极为狼狈”，后在郑氏的推荐下顺利地获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款协助”，使他既能维持生活，又能继续研究工作；^⑧王德昭回忆，他在联大毕业后，有志于中学教育，郑氏随即亲笔致函贵州教育厅负责人，予以推荐。^⑨应该说，这也是其深受学生爱戴的重要因素。

结 语

以上从“观世”的策略、“顺世”的智慧和“入世”的经验三个层面，笔者梳理分析了郑天挺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实践。近代以来，在“学术自由”思想影响下，人文学者更崇尚独立精神，甚至逐渐形成了一种羞于与政治、行政为伍的传统，许多学者都有类似的思想倾向，郑天挺也一度如此。^⑩这一追求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它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职业化、专业化和科学化，但久而久之也无形中把大量研究学院化、书斋化。郑天挺的经验说明，学术研究固然是实现经世致用理想的关键与基础，但同样重要的是要使学术成果走出书斋，使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一步说，回顾中国数千年的史学传统，那些经典史学的作者，绝大多数都具有丰富的政治与社会经验，这是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历史现象。郑天挺的经历说明，个人学术成就固然重要，经世致用追求下的公共贡献同样不可或缺。

(作者胡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邮编：250100)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 凯)

①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413页。

②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第693页。

③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第732页。

④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258页。

⑤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247页。

⑥ 封越健《“郑天挺教授诞辰百年纪念会”暨雕像落成仪式纪要》，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899—1999)》，第390页。

⑦ 郑天挺《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益世报》1947年9月7日。

⑧ 何兹全《悼念毅生师》，《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⑨ 王德昭《铿然舍瑟春风里——述往事忆郑天挺毅生师》，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58—59页。

⑩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182、391页。

His strong critical thinking allows him to identify some institutional flaw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dynasty , and some of his conclusions are still quite enlightening to scholars today.

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History Workshop and the Rise of Social History in South Africa // Li Pengtao

In the 1970s , social history studies in South Africa flourish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anti-apartheid struggle , especially represented by the History Workshop at 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 Johannesburg. The Wits University History Workshop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universal African historiography , while representing its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The Wits University History Workshop had actively promoted a “bottom-up” approach to social history writing , taking history as a tool for anti-apartheid struggle. It strived to awaken the black people to think about their own historical status and to remember their historical mission. The workshop had greatly induced the rise of social history studies in this country , and i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n historiograph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cro-narratives in Western Microhistory // Wang Chaoqun

Microhistory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the opposite of macrohistory and therefore regarded as synonymous with the “fragment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However , this is not the case. In fact , micro historians are active in constructing macro historical narratives while focusing on historical details. They have proposed the concepts of “normal exception” and “variable scale”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ir macro-narratives. In practice , they have establishe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micro-level , macro-level , and even global-level in history through identifying individual-society correlation , using symbolic metaphors , tracing changes , and offering thick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 to name some examples. Their effort to connect microhistorical research and macrohistorical narrativ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luralist academic context in which they lived. The entang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history and macrohistory , especial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history , is instructive for us to step out of “fragmented” history and to establish a dialectical and pluralistic historical cognitive model.

How Can Historians Change the World ? Zheng Tianting 's Historical Practice and Its Significance // Hu Wei , Zhao Xingsheng

In order to carry forward the extraordinary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 especially of moder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 we need to pay equal attention to study general theories and to excavate historians' individual practices. By doing so , we can set up examples and offer guidance for future researchers. Historian Zheng Tianting's practice is a good example. He had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view on how to apply scholarship to changing the world: his “observation of the world” was to focus on national welfar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his “living by the world” was to follow the general trend of times; his “involvement in the world” was characterized by his excellent skills of applying scholarship to worldly practice , by his respect of moral values such as loyalty to the country and forgiveness to the enemies , and by his attentiveness to people's living need. His practice inspires us that academic research needs to be combined with concrete practice , and that , for a scholar , while individual scholarship is important indeed , public contributions by ways of worldly application are equally indispensable.